

1949—1978年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运行经验 及历史启示^(*)

朱高林

(扬州大学 商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农村集体化时代,我党坚持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采取重心向下、面向工农的发展战略,开展了由基层政府主导的群众性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活动,构建了有线广播网、电影放映网、文艺演出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形成了以农村基层组织(公社、大队甚至生产队)为主、县级政府为辅的公共文化供给体系,广大具有一技之长的农民群众成为公共文化的供给主体。在农村公共文化生产供给过程中,我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采取低成本生产、集中统一供给、公开免费开放、以评促建等一整套措施,极大提高了运行效率,尽最大可能满足了世界上文盲人口大国的公共文化需求。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虽然环境变化了,但过去有效的做法,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好独处与群居、政府与市场、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等一系列关系,有条不紊地推进乡村振兴,丰富乡村公共文化生活,满足农民精神需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民公社;文化生活;历史启示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21.05.017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把“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作为一章进行专门部署,提出从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加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等三个方面为广大农民提供高质量的精神营养。面对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生活匮乏,泛娱乐化、荒漠化趋势明显,封建迷信、宗教势力抬头的严峻形势,该怎样丰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生活,实现农民从“富口袋”到“富脑袋”的历史性转变,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现实课题。

知过去才能图未来。农村集体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采取重心向下、面向工农的发展战略,开展了由基层政府主导的群众性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活动,构建了有线广播网、电影放映网、文艺演出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大量具有一技之长的农民经过短期培训,变成了公社广播员、电影放映员、文艺宣传员、扫盲教师,成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 and 传播者,也成为新中国文化贫瘠的农村的最早拓荒者。这些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农村居民近乎免费享有

作者简介:朱高林,扬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消费史。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消费史(1949—2019)”(19ZDA058)的研究成果。

的农村公共文化活 动,虽然在后期充满政治化色彩,但客观上仍然起到了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丰富农村公共文化生 活,树立集体主义观念,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积极作用。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虽然环境变化了,但农村集体化时期党和政府组织领导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 好经验、好做法,对于我们有条不紊地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丰富农民文化生活,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当前学术界对集体化时代农村居民公共文化生 活进行研究的理论成果还不多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不同领域对农村公共文化生 活进行间接的零星论述。李道新、刘广宇、张启忠、刘君、李小东等学者对集体化时代农村电影放映队的建立与运作、农村露天电影的发展及其对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影 响进行了探讨;⁽¹⁾杨波、赵玉明等学者对农村有线广播在政治动员、社会控制及其对农民心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²⁾马云、苏泽龙、岳谦厚等学者对农村集体化时代扫盲运动及其对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农村精神风貌的改造进行了研究。⁽³⁾二是从不同视角对农村公共文化生 活进行间接的零星论述。一些学者从农村文化建设的角度,对农村公共文化生 活的变革进行研究。如,黄雪丽认为伴随着社会管理体制的急剧变革,传统村落的自治领袖走下公共舞台,国家权力全面进入村落的社会文化生活;⁽⁴⁾张良提出国家从实体性文化、规范性文化、信仰性文化三个层次开展农村文化建设,将核心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植入农民信仰中;⁽⁵⁾吴理财认为农村公共文化建 设最大成就是将国家意志渗透到农民思想意识中,进而对其行为产生强大支配力,服务于国家建设。⁽⁶⁾一些学者从公共产品的角度,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进行了研究。如,郭瑞萍、黄丽华、辛波和于淑俐等学者认为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存在供给主体单一,供给渠道狭窄,制度内供给明显不足问题;⁽⁷⁾张天学、许莉和万春认为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采

取的自上而下、统一供给的制度安排对于需求高度一致的乡村社会而言,是具有高效率的。⁽⁸⁾还有一些学者如张乐天等人从人民公社史的角度,利用大量的档案资料,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文化生 活进行了零星的论述。⁽⁹⁾三是从整体上对农村公共文化生 活的特点进行零星评述。郁大海、王樱娜认为,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公共文化生 活表现出极高的一致性与同质性,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¹⁰⁾张良认为,农村基层通过“节日狂欢式文化活 动”“政治动员式文艺表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式的活 动和聚会”等剧场化表演、行政聚会式的文化活 动,既填补了农民的精神生 活,又将国家意志、核心价值渗透到农民思想意识之中;⁽¹¹⁾张新光、张良认为,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农民物质生 活虽然贫乏,但精神生 活是比较充实和快乐的。⁽¹²⁾

综合上,学术界无论是从电影史、广播史、教育史等领域进行研究,还是从农村文化建设、公共产品供给、乡村治理等角度进行研究,都是从不同侧面对农村在有线广播、电影放映队、扫盲运动等方面的农村公共文化建 设情况进行探讨,而对这些公共文化建 设对农民日常生 活的影响、农村精神风貌的变化关注偏少,农村公共文化建 设的效果没有通过农民文化生 活的变化反映出来,处于有“建 设”无“生 活”的研究状态。另外,学术界对农村公共文化建 设从消极方面进行反思教训的多,从积极方面进行正面总结经验的少。农村集体化时期,我国通过公共文化活 动的方式把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到农民思想观念中,在丰富农村居民文化生 活的同时,塑造了新一代农民的精神状态,对于实施农业支持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总结回顾这一时期党和政府推进农村公共文化生 活的基本经验,对于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生 活放任自流的状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二、中国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构建

为加强对农民集体主义观念的培养,同时解决农民文化素质偏低、精神生活匮乏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采取重心向下、面向工农的发展战略,开展了由政府主导的群众性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活动,形成由县、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组成的多层次供给渠道,形成了由农村有线广播网、农村电影放映网、农村文艺宣传队(后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农民业余学校(扫盲学校)等组成的多层次供给平台,同时也形成了由广播员、电影放映员、文艺宣传员、扫盲教师等广大农民组成的多层次供给队伍,搭建起农村公共文化生活供给体系。

(一) 以县广播站为中心,建立由县广播站—公社广播放大站—大队转播站—入户喇叭构成的农村有线广播网

1956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1956年起,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要求大部分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盐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都能收听广播”;1958年4月全国第五次广播工作会议要求,在1960年前基本完成乡乡和80%的农业合作社都有收听工具。各地相继成立专门机构,制定发展计划,推进农村有线广播建设。公社广播放大站、大队转播站雨后春笋般地迅猛发展,入户喇叭数量成倍增加。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全国各地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13]的指示,再次掀起全民大办广播热潮,农村广播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广播喇叭不仅进村入户,还走进田间地头。据统计,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已有2323个县(市、旗)建立了广播站,4.92万个人民公社建立了广播放大站,占全国公社总数的88.4%;农村广播喇叭总数达1.11亿只,其中入户喇叭1.07亿只,占65.5%的农户安上了广播喇叭,^[14]全国农村基本上建成了以县广播站为中心,以公社广播放大站^[15]为基础,连接千村万户的农村有线广播网。为保障有线广播网的运转,各县设立广播站,隶属县委宣传部,内设站长、编辑、播音员、技术员若干,县广播站除按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各地联播节目”和本省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外,还自办如新闻报道、文艺节目、实况广播^[16]等地方节目。公社设有广播放大站,配备专职广播员,主要转播县(市)广播站的节目,有时还自办节目,如本社新闻、专题广播、文艺节目等等,不固定播出。各大队设立转播站,有播音室,配备兼职广播员,一般由大队支书、团支书担任。这样正如表1所示,从中央到基层架起了一座联通的桥梁,中央精神、文艺节目、农业知识通过县广播站—公社广播放大站—大队转播站—入户喇叭,进入千家万户。

表1 1966—1976年温岭县广播事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年份	县有线广播站(个)	区转播站(个)	公社广播放大站(个)	已通广播大队数(个)	广播线路总长(公里)	其中:县至公社(公里)	其中:双线(公里)	广播喇叭(只)	平均每户一只喇叭(户)	田头喇叭(只)
1966	1	8	2	780	1546					
1967	1	8	1	787	1860					
1968	1	8	3	791	2090					
1969	1	8	7	801	2297					
1970	1	8	26	802	2461					
1971	1	8	46	802	3094	447	53	62130	3.1	21
1972	1	8	54	803	2841	447	51	71673	2.7	27
1973	1	8	61	801	5896	447	56	81000	2.4	40
1974	1	8	60	805	5953	502	56	89786	2	90
1975	1	8	61	804	5896	447	91	94069	2	208
1976	1	8	61	804	5896	447	91	95050	2	220

资料来源:李步西主编《温岭市广播电视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2页。

(二) 以县电影管理站为中心,构建由县、公社、大队三级电影放映队组成的农村电影放映网

1950年文化部电影局在南京举办了“放映训练班”,在全国组建600个电影放映队。农村电影放映队最初是由县文教科或文化科组织的,负责到全县人民公社巡回放映电影。1953年12月2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电影放映事业,以逐渐达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影放映网”,并指出“电影放映事业发展的方针是首先面向工矿地区,然后面向农村;在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则以发展流动放映队为主”。1958年6月文化部发出《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自办电影队的通知》,各县电影放映队下交到人民公社管理,各地人民公社普遍建立自己的电影放映队。放映人员主要是从农村招聘而来的,县电影管理站负责对其进行技术培训,提供片源。公社电影放映队属集体所有,自负盈亏,国家支持,服务群众,业务由县电影管理站管理,行政归公社领导。进入20世纪70年代,一些大队也办有电影放映队。1958年农村开始出现人民公社主办的电影放映队,1961年农村电影放映队发展到12308个,到1976年增加到81367个,如果按一个放映队有2名队员计算,那么1976年全国有16万人在农村常年从事流动电影放映。公社、大队电影放映队除在本公社、本大队轮流放映电影外,有时还主动到周围其他公社的大队放映电影。这样在广大农村活跃着县、人民公社、大队三级电影放映队,呈现村村挂银幕、寨寨放电影的景象。到20世纪70年代,各地人民公社纷纷建立文化礼堂,农村电影放映出现室内放映,但室外露天放映仍是主流。正是由于农村人民公社电影放映队,乃至后来生产大队电影放映队的出现,极大方便了农民群众观看电影,农村电影放映场次和观看人数直线上升。据统计,全国电影放映场次从1949年13.9万次增长到1978年2621.4万次,人均年观看次数从1949年的0.1次上升到1978年的24.3次,到1978年全国居民平均每半

个月就能看上一场电影,这个数字与当时的世界发达国家相比都是很高的。

(三) 构建由县农村文艺宣传队—公社文艺宣传队—大队、生产队文艺宣传队组成的农村文艺宣传网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各地人民公社纷纷成立文工团,配合政府中心工作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在公社范围内进行巡回演出。受内蒙古“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成功经验的影响,1965年,全国各地县级党和政府纷纷成立乌兰牧骑式农村文艺宣传队,通过文艺演出活动,把社会主义思想输送到农民群众中去,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各县农村文艺宣传队属于全民所有制文化事业单位,由文化局主管,人员是由机关、学校、剧团中抽调的优秀人才和从社会上选拔的文艺爱好者组成,编制一般在15人左右,人员工资及所需经费由县财政拨款,演出所需服装、道具、乐器都由政府配齐。他们以小队伍、小装备、小节目的活动形式,到农村义务演出,不收取任何费用。同时,还担负辅导农村业余文艺队伍的任务。(见下页表2)一些人民公社也成立有自己的文艺宣传队,由公社文化站管理,队员都是从农村抽调来的业余文艺青年,集体吃住,全脱产从事排练演出活动,由生产队以记工分形式给付劳动报酬。⁽¹⁷⁾有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大队,甚至生产队也成立有文艺宣传队,分别属于大队俱乐部、生产队文化室,半脱产从事演出活动,上午在生产队出工,下午在大队部集中排练节目,晚上到各生产队巡回演出。据《王乐井乡志》记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按照上级党委、政府的要求,王乐井公社各大队办起了活跃农村阵地的文艺宣传队,每年秋粮打碾结束,各大队向各生产队抽调人员,集中于大队部组织排练。排演成一定数量的节目后,分赴各大队所属的生产小队巡回演出;有时将相邻大队的2个宣传队的节目轮换巡回演出;有时将几个大队的文艺宣传队排演的节目集中比赛后,各抽出较好的节目组成一个演出班子,巡回全公社演出。⁽¹⁸⁾个别时期,农村中

表2 1965—1979年南海县文艺宣传队负责人、在编人数及演出情况表

年份	队长	指导员(辅导员)	在编人数	演出场次(场)	财政拨款(元)
1965	任文	张风	15	250	
1966	任文	张风	15	220	
1967	任文	张风	15		
1968	任文	张风	15		
1969	万华	张风	15	220	
1970	万华	张风	15		
1971	万华	张风	15		
1972	万华	张风	25	250	
1973	张风(副)	李文淑	25	120	21702
1974	张风(副)	李文淑	25	229	23000
1975	万华	李文淑	30	196	23000
1976	万华	肖植荣(副)		185	25661
1977	万华	肖植荣(副)		180	25490
1978	肖植荣	张风		183	
1979	肖植荣	张风	27		

资料来源:佛山市南海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南海市文化艺术志》,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363页。

小学校也成立有文艺宣传队,为农民群众演出。农村文艺宣传队后改称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继续在农村演出。这样从上到下搭建起来一条由县农村文艺宣传队—公社文艺宣传队—(有条件的)大队、生产队文艺宣传小分队组成的二级、三级或四级的繁荣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文艺演出网络。

(四) 广泛开展以县、公社扫盲委员会为领导,农民业余学校为阵地,群众教师为主力的群众性扫盲运动

1950年9月20日,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通过了《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行办法》等6项草案,明确工农教育的基本任务,一方面根据各地区实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识字运动,逐步减少工农群众中的文盲;另一方面进行工农干部文化教育,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第一次将工农教育提到国家议事日程。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等部门,负责统一领导全国扫盲工作。⁽¹⁹⁾随着国家扫盲组织的建立,基层扫盲组织相应叠生,并呈现步步跟进

的特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县、公社都建立了相应的扫盲机构,制定扫盲计划,开展扫盲教育工作。各县文教科成立扫盲办公室;人民公社成立扫盲委员会、扫盲办公室、扫盲指挥部等名称不一的机构,配备专职扫盲干部;各生产大队成立扫盲领导小组,抽调专职教师上课,举办扫盲班,初称冬学,后变成农民常年业余学校。⁽²⁰⁾扫盲场所一般利用小学教室、祠堂庙宇或生产队房屋作教室。所用教材由人民公社或大队购置,免费发放给学员,办公费及学员灯油开支从生产队公益金中支出。为解决师资短缺问题,党和政府坚持“以民教民”的原则,以群众教师为主,以专职教师为辅,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形成了专职教师、群众教师、小学教师、小先生组成的一支庞大的群众性扫盲队伍。专职扫盲教师多采取记工分的形式给予劳动报酬,在所属生产队参与收入分配。

三、中国农村居民公共文化生活的运行

从以上分析可知,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体系主要由“三网”和“一校”组成,即由农村有线广播网、农村电影放映网、农村文艺宣传网、农民业余

学校(扫盲学校)等组成的多层次供给平台,有的是常年性的,有的是临时性的,把党的政策、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欢声笑语传播到农村千家万户;广大广播员、电影放映员、文艺宣传员、扫盲教师,既有县财政支持的国家公职人员,又有从农村招聘而来的由基层自己想办法解决报酬的人员,而后者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工分就成为支撑文化服务的重要支柱。农村基层组织在发展公共文化活动中,坚持从实际出发,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走出了一条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繁荣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有效途径,尽最大可能满足了世界上文盲人口大国的文化需求。

(一) 在生产环节,硬件就简,软件复制

我国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领导作用,把公共服务事业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共建共享的公共文化活动中来。农民群众既是公共文化的建设者,又是公共文化的享受者,极大推动了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化设施上,因陋就简,讲究实用。为构建农村有线广播网,各地发动群众,因陋就简,土洋结合,自制土广播,架设广播线路,广播喇叭进村入户;农村扫盲没有固定场所,使用祠堂、小学教室作为教室,甚至田间地头也成为农民群众学习的场所。在教室里布置一些长短不齐的课桌、长凳,在田间地头就席地而坐,小黑板一挂便开始讲课。县农村文艺宣传队所使用设备简单,一台扩音机、一只高音喇叭、两盏汽灯和一些简单乐器,就是全部的家当,演出道具由演员自己制作;演出不拘泥场地,有时到水利工地,有时到修路现场,有时到田间地头,一旦群众要求,就放下挑担,直接演出。二是人员队伍上,以农民身份的地方队为主,以具有事业编制的国家队为辅。像广播员、电影放映员、文艺宣传员、扫盲教师这类人员,由县级政府设置事业编制、专门抽调人力、发放财政工资的正式人员是很少的,绝大部分人员都是由人民公社或大队从有一定文艺专长的农村青年中招聘

而来的,经过短期技术培训或专业下乡队伍的培养,逐渐走向工作岗位,承担着放映电影、文艺表演、广播宣传、扫盲教育的任务,以工分的形式从所在生产队获取劳动报酬,甚至是无偿服务。^[21]尤其在扫盲运动中,政府采取“以民教民”的方法,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在扫盲队伍中,既有农村小学教师、已经脱盲识字的农民,又有大批投入农业生产的初高中毕业生,还有正在上学的中小學生,^[22]大多数人不计报酬,义务投入到扫盲运动中,出现了“夫教妻”“子教父”“能者为师”“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大家动手,扫除文盲”的动人场面。很多人亦文亦农,亦师亦农,亦工亦农,扎根农村,不拿工资,只记工分,大大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降低了工业化发展成本。三是文化成果上,针对农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状况,采取无穷复制的方式传播快乐。中央、省级、县级、公社等广播单位每制作一期节目,通过一分二,二分四,以至无穷的广播线路传递到千家万户;县、公社、大队文艺宣传队每排练一场节目,可以在全县、全公社范围内巡回演出,多次复制,把文艺的快乐播撒到每一个人的心田;一部影片拍摄完成后,被拷贝成无数个电影胶片,在全国各地地毯式轮回放映,把电影的娱乐功能发挥到极致,让更多人享受到文化产品带来的欢乐。“我印象特别深刻,光标放的第一部电影就是他最喜欢的《雷锋》,33个村子一个也没落下。放了33遍,他也看了33遍。”^[23]同一部电影常常80%的群众都看过,有时看过两遍三遍。“我们那时看乡村电影,明明知道两部影片非得放映完所有村庄才换新影片,可还是天天晚上跟着放映队走,今晚在这个村子看,明晚在那个村子看。……几乎是天天夜里看都不烦。”^[24]

(二) 在分配环节,严密组织,统一供给

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必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体,当个体农民变成合作社社员之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走向统一化,文化需求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然由国家统一供给。国家作为公

共文化产品的提供者,具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和集中供给的特点。一是严格的组织化。无论是广播、电影、文艺宣传,还是扫盲运动,都无一例外建立了从上到下的领导机构。通常在县级机构建立常设领导机构,如广播站、电影管理站、文艺宣传队等等,有固定的人员编制,一切活动开支由财政负担,各地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也有专门机构和队伍负责,形成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的纵向一条线管理系统,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提高了各项公共文化活动的运行效率。二是集中统一供给。公共文化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国家在供给上表现出明显的集中性、集体性,而非分散性、个体性,这样做可以节约供给成本,提高使用效益,而且这种整齐划一的供给方式比较适合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农民群众。这种固定的无选择性的供给方式也使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表现出极高的一致性与同质性:

1. 场地固定。为了方便群众观看电影、文艺演出,平原地区电影放映点、文艺演出点大都设在生产大队办公所在地,山区则设在生产队和自然村;在相隔距离很近的生产队和自然村,就设轮换点,使每一个村庄都能挂上银幕,搭上戏台。生产大队或生产队腾出专门的屋子作为固定场所,供冬学和后来的常年业余学校扫盲使用;有时候小学或中学教室也成为扫盲的重要阵地。
2. 时间集中。广播节目选择在早中晚三个时段进行播出,电影放映、文艺宣传演出通常在生产劳动间隙的晚上进行。扫盲学习活动开始选择在冬季农闲季节进行,后来冬学变成农民业余学校之后,学习时间固定在晚上。农村文化活动选择在晚上或农闲时间进行,目的是保证绝大多数农民能够在生产劳动之余,享受到文化生活带来的快乐,恢复体力,增长智力,更好地从事生产劳动。

(三) 在消费环节,一视同仁,近乎免费

农村集体化时代,精神文化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由国家以极低的价格或者免费的方式供应给农村居民,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

征。消费者数量的增加,并不会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和消费效果的降低,消费者不必为此展开竞争或争夺。既然精神文化产品具有这些特征,那么公共产品所能覆盖的人数越多,所能实现的社会福利也就越大,产生的社会效果也就越好。一是对外公开。为了使每一部电影、每一台演出发挥应有的娱乐效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我国以追求社会效益为目的,面向广大农村采取流动放映、演出的方式,不设围墙,露天开放,队里队外十里八乡的农民,不管男女老幼都可以免费观看。今天你来我们生产队看,明天我去你们生产队看,人们之间似乎达成了默契,相互之间并不排斥,能够最大限度地囊括中国社会最广泛的基层受众群体。广播喇叭装置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乃至进村入户,广播节目一天分早中晚三个时段,定时向广大农民群众播放各级联播节目。农民群众足不出户,及时了解外界的信息,了解上级各种政治、经济活动的计划安排。二是一视同仁。针对少数民族听不懂汉语的情况,广西、福建、内蒙古、西藏等地的一些电影放映队学习用傣语、福州话、蒙古语、藏语为影片配音解说;凡符合条件的文盲不分性别,一律进行扫盲,很多妇女、老人加入到扫盲运动中来。⁽²⁵⁾三是近乎免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如放电影、文艺演出往往采取个人观看、集体付费的方式,由生产队包场,从公益金中扣除,供广大农民免费观看;扫盲运动所用教材由公社财政或生产队用公益金购买,⁽²⁶⁾因公共文化活动的直接向农民收取的费用很少。1956—1969年曾收取用于广播喇叭日常维护的广播收听费,每月每只喇叭收取0.3~0.4元;1969年1月,公社广播站日常经费列入地方财政,停止收取收听费。因此,集体化时期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中用于文化生活服务的支出微乎其微。1954年人均1.62元,到1978年增长到3.16元,所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经过24年没有发生变化,仍为2.72%,处于徘徊不前状态。⁽²⁷⁾这种普惠制公共文化活动消除了一切阶级地位、身份贵贱、贫富

差距的先天性不平等,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享受文化、接受教育的权利,为人们改变生活提供了一个公平的起点。

(四) 在事中和事后环节,加强过程管理和结果管理

一是加强过程管理。为了保证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对电影放映、广播播音等技术要求较强的岗位,加强业务知识培训,实行技术资格认证。县广播站对公社广播员不定期举办业务培训班,培训无线电基础知识、有线广播网架设、维护及入户喇叭安装调试等内容。对各公社报道员、大队业余报道员举办新闻写作培训班,进行新闻采访写作知识培训。组织农村电影放映人员参加技术考核,对通过考核的人员分别发放一等、二等、三等放映员和见习放映员资格证书,⁽²⁸⁾制定影片拷贝维护管理和奖惩办法,加强对电影胶卷的管理。扫盲运动实行学习考勤制度,对于缺课学员给予扣除工分的惩罚,⁽²⁹⁾对学习优异的学员实行工分奖励,对于通过毕业的学员发放扫盲毕业证书,⁽³⁰⁾对未脱盲的男女青年采取推迟开结婚证明的办法。⁽³¹⁾二是加强结果管理。为检验工作成效,每隔一段时间都进行自下而上的层层评先、经验交流、技术比赛活动,达到学习先进、鞭策落后,促进工作的目的。主要做法有:1. 树立标兵。在各行各业推出一大批积极分子、学习标兵和优秀模范,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为人们树立学习的目标。在电影放映方面,各地评选出诸如“县优秀放映员”“省优秀放映员”、“四好”电影放映队、“八好”电影工作者、“全国电影放映先进工作者”等名称不一的荣誉称号。扫盲评先更为复杂,从分类看,有管理类的扫盲模范干部,教育类的扫盲模范教员、扫盲积极分子,学员类的扫盲模范学员;从单位看,有扫盲模范乡、扫盲模范村;从级别看,有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扫盲先进单位或扫盲模范。2. 多层级的经验交流活动。省、地(市)、县、人民公社及各个系统、各个单位组织召开不同层级的现场交流会、报告会、讨论会、座谈

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等,如电影放映经验交流会、扫盲经验交流会、扫盲积极分子大会等,交流学习各地进行电影放映、广播建设、扫盲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我国曾在1956年、1958年两次召开全国扫盲积极分子大会,各地为了筹备大会、选拔扫盲积极分子,扫盲积极分子大会从基层一直开到中央,从全县(区)扫盲积极分子大会、全地区(市)扫盲积极分子大会、全省扫盲积极分子大会,一直到全国扫盲积极分子大会。3. 开展大比武活动。各地组织电影放映人员开展群众性爱机护片和技术比武活动,考核影片拷贝维护措施,以提高胶片使用寿命和放映质量;文艺演出比赛活动往往从基层开始,由人民公社组织全公社文艺宣传队进行文艺汇演,选拔和审定一些优秀节目参加全县文艺大汇演,再由县里评审出优秀节目参加地区、全省的文艺大汇演活动,通过层层选拔评比,学先进,找差距,提高文艺演出水平。据知青傅治淮回忆,1974年元旦,公社举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艺汇演,“出征的头天晚上,支书提来两把面条犒劳我们。队员们发誓,一定要夺第一名。天从人愿,在公社礼堂,我们以绝对优势居于各大队宣传队之首。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宣传队与完小的宣传队一起代表公社去永兴参加汇演,我们为公社争得了二等奖。”⁽³²⁾

四、中国农村居民文化生活的历史启示

集体化时代,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政治形势的影响而跌宕起伏,经历了一个由前期服务生产、丰富群众生活的社会功能,向后期服务阶级斗争的政治功能转变过程。每当政治形势紧张的时候,后者的功能进一步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农村公共文化形式上的繁荣。虽然政治色彩浓厚,但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精神生活贫乏的农民群众来说,仍然是十分难得的精神盛宴。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重视对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建成了有线广播网、电影放映网、文

艺宣传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一方面,把银幕挂在了村庄,让喇叭走进了农户,文盲步入了学堂,犹如黑暗中打开了一扇天窗,照亮了千百年来黑暗愚昧的村庄,农民群众每日每夜享受着精神的食粮,使他们在劳动之余获得无限的欢乐;另一方面,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广大农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摆脱了目不识丁的愚昧状态。大量农业气象、施肥种植、灌溉抗旱等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农业科技素质,成为了农业战线上的生产能手。更为重要的是,农民群众在参与公共文化活动过程中经历了从文化再造到精神再造的过程,各种旧思想、旧习惯得到摒弃,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得到改变,集体主义意识得以确立,从过去自私自利、自由散漫的个体农民改造成有团结意识、奉献精神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新一代农民,民众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崇尚知识、热爱劳动、热爱集体、追求平等的社会风尚日渐形成,整个中国农村变成了“全新的社会”,为中华民族以崭新风貌在世界东方的崛起奏响了序曲。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组织运行的一系列措施对于今天构建乡村文化生活,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仍然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是处理好“独处”与“欢聚”的关系,公共文化活动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纽带。集体化时代,以人民公社一生产大队一生产队为单位的管理系统把小农社会时期一个个类似土豆的孤立个体编织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们在集体中劳动,在集体中生活,在集体中学习,几乎一切活动无不在集体这个大家庭中完成。看电影、观演出、参加扫盲运动,这些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群众性集体文化活动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交流生活的平台。每一次公共文化活动都是一次难得的群众性集会,“银幕一挂、电灯一亮、喇叭一响,成百上千的群众就可以聚集在银幕周围。”⁽³³⁾人们在呼朋引伴中,在窃窃私语中,在欢声笑语中,相聚相叙,家长里短,陈年旧事,

婚丧嫁娶,无所不谈。与其说是公共文化活动给人们带来欢乐,不如说公共文化活动给人们带来相聚的欢乐。正如学者邵培仁、杨丽萍所言,“观看露天电影为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提供了更加开放的平台,精力过剩的少年儿童、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絮絮叨叨的家庭主妇和久未谋面的乡党邻里等等,都能在这种氛围里获取适合的对象进行交流,在观影过程中得到更多的身心抚慰。”⁽³⁴⁾人,从本质上讲首先是一个社会人,是一个适合过着群居生活的动物。人们在群体中过着快乐的生活,离开了群体,人们就倍感孤独、无助。对于人类来讲,在某种程度上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要高于物质生活。所以农村集体化时代,尽管物质生活比较贫乏,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快乐的,人们总是怀恋过去曾经经历的美好时光。反观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先具有公益性质的公共文化活动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衰退而消失,村村看电影、家家听广播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广播、电视、互联网信号走进千家万户,收音机、电视、电脑等电子产品使原来必须集体欣赏的文化活动变成了分散的个体活动,“宅男”“宅女”大量涌现。人们画地为牢,生活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听广播、看电影、打游戏、发信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彼此孤立的空间内完成。因此,人们虽然现在物质生活富有了,但依然感觉到不快乐,抑郁症、自闭症、厌世症患者增多,自杀率上升,主要原因是人们日益游离有组织的集体生活,背离人的社会属性。如此看来,生活在物质条件日益充裕的现代社会的人们总是怀念过去的集体生活是有一定道理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让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涌向城市,留守在农村的妇女、老人因失去丈夫和子女的陪伴而缺乏精神的慰藉、情感的交流。残缺的农村公共文化活动隔断了人们之间最后的联系纽带,人们距离虽然很近,但心灵隔得很远,犹如高高的围墙把每一个人分割包围了起来。精神的荒漠为宗教在农村蔓延提供了土壤。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宗教

活动场所、信教人数快速增长。人们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举行聚会,念圣经,唱圣歌。很多老年人拄着拐杖不辞辛劳坚持每周参加礼拜活动,除了祈祷祛病消灾外,更重要的是寻求精神交流的机会,回归集体,战胜孤独,恢复人的社会属性。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555个有效样本中占73.96%的信教老年人认为信教提高了自己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³⁵⁾这些从反面证明了农村精神生活的匮乏和开展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紧迫性。因此,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必须紧紧把握人的社会性这一本质属性,扩大公共文化活动的供给,让人们在集体活动中获得精神交流的机会,在享受文化生活过程中寻找到快乐。

二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农村公共文化生活不能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泛滥四溢。正如表3所示,对于大多数产品(包括服务)来说,消费者是最好的质检员,能够形成一致的评价机制,比如物质产品的质量高低、教育服务的升学就业情况、医疗服务的疗效如何,在消费者挑剔的目光中,推动产品的质量不断提升。靠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解决产品质量问题,政府当好守夜人的角色,管好法律就行了。但是,文化娱乐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单靠市场机制是无法解决质量问题的。文化娱乐产品缺乏统一的评价机制,寻求愉悦的精神享受来自每个人的主观感受,阳春白雪不一定是普通人的最爱,满足人们感官刺激的低俗文化产品在普通民众中更受欢迎。文化娱乐产品评价的向下性特征与其他产品评价的向上性特征形成鲜明对比。近年来,荒诞的电视剧、低俗的相声小品大行其道,文艺舞

台上充斥着小孩逗大人、傻子哄常人、男人娘娘腔、女人包公调的怪现象。在农村集贸市场,各种草台班子利用演出大棚作掩护进行低级趣味的文艺表演屡禁不止,甚至农村遇到红白喜事请草台班子进行“脱衣舞”“唱黄歌”等庸俗表演也早已习以为常。大量低级趣味的自发性、自娱性文化活动增多,赌博、吸毒、卖淫、博彩活动猖獗,封建迷信、宗教活动抬头,农村公共文化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农村文化活动如果不加限制地任由市场机制牵着鼻子走,势必会污染人们的精神圣地,把精神生活引向庸俗不堪、杂草丛生的邪路上去,发生市场的趋利本性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相偏离问题。农村公共文化必须带上社会价值的笼头,根本原因在于公共文化不仅具有精神娱乐功能,还带有价值导向功能,担负着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神圣职责。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广大农村“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去占领”的提法,对于今天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去占领,那么各种低级趣味、庸俗不堪的文化,甚至封建文化、宗教势力就去占领。农村集体化时代,政府是文化产品的唯一生产者、供给者,电影、广播、教育、文艺宣传成为教育群众、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有效载体。农村公共文化的性质被党和政府牢牢地掌握着,充分体现党的意志,使集体主义观念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确立。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党和政府必须紧紧抓住文艺产品的生产关口,加大对文艺产品的创作监管力度,扎紧

表3 一般产品与特殊产品的评价机制比较

分类	举例	评价机制	特点	供给方式
一般产品	物质产品和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产品	市场机制	向上性	市场
特殊产品	文化娱乐产品	主观心理	向下性	政府或政府约束下的市场

出口,保证源头是一汪清水。文艺产品创作出来后,谁来传播不要紧,既可以是市场的,也可以是公益的,可以允许多种艺术形式、不同文化队伍来传播文艺产品,把欢声笑语带给农民群众。对于文艺演出队伍,实施负面清单制度,一朝违规,予以禁演。文化市场监察部门不能只做事后诸葛亮,进行扫黄打非,一罚了之,要监督前移,用有效的制度把精神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规范起来,使人民群众在文化活动中感受快乐、获得教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宣传和弘扬,推动全社会形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三是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建立一支不走的农村文艺队伍。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农村基层组织想办法解决,国家财政投入很少。虽然各地县级政府组织有农村电影放映队、农村文艺宣传队,深入到全县基层农村为农民放映电影、演出节目,但这种偶然的外部的输血式的文化下乡活动很难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农村基层组织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决定建立自己的文化队伍,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很多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都拥有自己的电影放映队、文艺宣传队、扫盲教师、广播员,常年深入农村生产第一线,亦文亦农,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不走的文化使者,对于活跃农村公共文化生活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组织把发展公共文化活动的重点放在文化队伍的培养上。虽然层次不高,但能够在低水平上通过自娱自乐、自我教育的方式,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反观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增多了,建立了文化活动室、图书室、乡村大舞台,但大多成为摆设,农民以打牌、赌博、看电视为主的消遣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原因在于缺乏一支扎根农村基层的本土文化队伍,靠下乡慰问演出来满足农民精神需求,犹如甘霖不解饥渴。当前我们在支持文化志愿者深入农村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的同时,重点要放在培育本土文化队伍上。要借鉴人民公

社时期的老办法,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支持乡村文化能人,按照人员相对稳定性原则(见图1),依次从农村留守人员、赋闲农村的退休人员、放假回乡的农村大学生、候鸟般迁徙的农民工中,选拔一批具有文艺特长、热爱公益事业的人才,打造一支懂文艺、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文化队伍,增强农村基层的自身造血能力,长期持久地为农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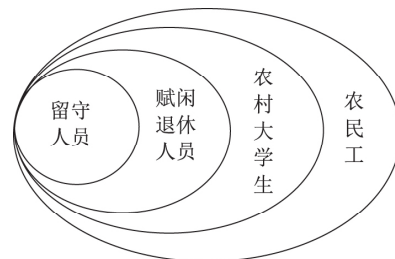


图1 农村文化队伍建构图(按照稳定性原则)

四是处理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注重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内容建设。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具有不同的增长规律。按照质量守恒定律,物质产品的生产是以消耗一定的物质资料为前提的,而精神产品的生产并不受质量守恒定律的约束。消耗很少的物质资料,甚至不消耗物质资料,就可以生产出丰富的精神产品供人们享用。而且精神产品的生产是能够复制的,可以通过不同形式,一传十、十传百地形成几何级数般的辐射效应,让更多的人学习文化、享受文化。因此,对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关键是人,在人的背后关键是制度。只要措施得力,制度有效,国家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在消耗较少物质资料的情况下取得精神文明建设的进步。⁽³⁶⁾限于有限的财力,人民公社在解决农村公共文化生活上,在硬件投入上一切从简,一部放映机、几套戏服、一只入户喇叭、一间教室、一片空旷的场地就构成了文化活动最基本的设施。农村基层组织把文化建设的重心放在“软件”建设上,每一项文化活动的推进都建立了从上到下严密的组织系统,有专门的领导机构、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专职的人员队伍,保障公共文化活动的有序进行。农村人民公社从机构、队伍、制度上,不断加强内涵建设,

充分克服客观条件的限制,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以求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活动收益。农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了一条自我主办、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路子。广大电影、文艺、广播、扫盲工作者满怀政治热情,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自觉性,常年深入到农村生产第一线,为社员群众送去精神食粮。

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与集体化时代恰恰相反,重硬件投入,轻软件建设。很多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得很漂亮,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各地村委会建设的文化活动室、图书室、文化戏台常常人去房空,大门紧闭,成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农村文化活动呈现软、散、乱状态,与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有直接关系。农村基层单位没有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具体负责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规划和安排。乡镇文化站只是负责农村文化市场管理,进行扫黄打非工作,成为局外的监管者,而不是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农村文化活动室、图书室、乡村大院负责人都由村支书兼任,一身数职,疲于应付。农村文化活动成为可有可无的应景差事,陷入无领导、无队伍、无制度的“三无”局面。为此,基层政府要改变一味强调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的思维定式,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把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根本追求,把丰富农村居民精神生活提高到重要日程。基层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克服懒散无为的状态,把农村文化队伍纳入到基层政府的管理工作中,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建立一套从上到下的运作机制,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农村公共文化生活,以农民群众为主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民群众性文化体育、节日民俗等活动,定期举办比赛或评比活动,促进农村文化活动走向深入。

注释:

(1) 李道新《露天电影的政治经济学》,《当代电影》2006年第3期;刘广宇《1949—1976年:江津农村电影放映队的历史沿革及运作机制》,《当代电影》2008年第10期;张启忠《“露天电

影”与农村的文化启蒙——十七年农村电影放映网的历史分析》,《艺术评论》2010年第8期;刘君《露天电影:从流动影像放映到公共生活建构》,《东南学术》2013年第2期;李小东《集体化时代电影进村与乡村话语革命化——以侯家营、沈家村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3期。

(2) 杨波主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马云《农民的“文化宝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村扫盲教材解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苏泽龙《20世纪50年代山西农村扫盲与农业生产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5期;岳谦厚、杜清娥《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省农村扫盲》,《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4) 黄雪丽《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悬浮化”的阐释——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图书馆论坛》2018年第2期。

(5) 张良《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农村文化的三维性分析——基于湖北、安徽两省八县(区)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2期。

(6) 吴理财等《当代中国农民文化生活调查》,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52页。

(7) 郭瑞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黄丽华《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辛波、于淑俐《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与转移支付制度创新》,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107页。

(8) 张天学、阙培佩《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许莉、万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路径变迁及现实选择》,《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2期。

(9)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10) 郁大海《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变迁与重建》,《学理论》2010年第14期;王樱娜《现代化视野下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变迁——以湖北洞村为例》,《价值工程》2014年第23期。

(11) 张良《农村文化与农村文化建设》,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2) 张新光《建国60年农民生活方式变迁的不协调性及成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5期;张良《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农村文化的三维性分析——基于湖北、安徽两省八县(区)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2期。

(13) 1965年9月5日,毛泽东为人民广播事业创办20周年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14) 周才夫《中国的有线广播》,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99页。

(15) 放大站的工作是每天按时接收省、中央新闻,分早、中、晚三次向境内播放。

(16) 将各级领导机关、群众团体召开会议的场所实况和各

文艺团体在剧场上演的节目,直接通过县广播站转播到全县各地和听众家里。

(17)据记载,一天跋涉演出很是辛苦,但在演出时有两个好处:一是每天队上补贴一个工,即10分,值1角5分钱;二是所到之处,每天三顿可以吃上白米稀饭和油炒过的大米干饭,以及一大盆热腾腾的炖肥肉荤汤。这两个好处十分诱人。参见岳定海《老盐亭》,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249页。

(18)《王乐井乡志》编委会编《王乐井乡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93页。

(19)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于1952年11月设置了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下设农村扫盲工作司,首次建立专管农村扫盲工作的统一机构。从1952年政府建立扫盲工作委员会算起,仅七年时间,农村扫盲领导机构几易变动:农村扫盲工作司(1952年)—教育部(1954年)—扫盲协会(1956年)—扫盲办公室(1959年),充分反映了国家对农民业余教育的重视。同时,政府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县、乡,尤其是各地农村都要设立相应的扫盲机构,保证扫盲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20)《教育部关于冬学转为常年农民业余学校的指示(1951年2月28日)》,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编《扫除文盲文献汇编(1949—1996)》,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9页。

(21)“那时文化生活枯燥,所以宣传队常常有单位来邀请去演出,附近的几个工厂,周边的大队都经常去,去了也不增加他们负担,不要说演出费,就是连招待饭也没得吃。”参见刘庆庆主编《西马匠志》,西马匠志编纂委员会,2012年,第249页。

(22)各地政府鼓励中小學生争当“小先生”,开展“一人百字”运动,要求每位中小學生在假期中教会一个文盲认识200个生字。

(23)陈立胜、高献霞口述,胡溪整理《首善家风——陈光标父母的回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8页。

(24)风信子《故乡背影》,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

(25)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规定“扫除文盲的对象以14~50岁的人为主,超过50岁的文盲如果愿意识字,应该欢迎他们参加学习。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干部、青年和各条建设战线上的积极分子中的文盲,应该自觉地积极地尽先参加学习,摆脱文盲状态。”1957年3月8日教育部《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通知》要求“着重扫除40岁以下工农群众中的青壮年文盲,40岁以上的文盲如果愿意参加识字学习,当然也要欢迎”,“干部中的文盲,除少数有特殊情况的人以外,都应该扫除”。

(26)据记载,公社财政每年拿出800元购买扫盲教材,统一发给学员。又免费发给学员单行本,有稻田养鱼、养蜂、柑桔、葡萄栽培技术,农产品加工等。参见政协湖南省祁阳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宣教卫体委员会、祁阳县教育局编《祁阳文史》第十九辑,《祁阳县教育志》第三卷,2007年,第296页。

(27)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中国社会统计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第80、81页。

(28)1955年国家进行工资改革,制定了《剧院、影院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对电影放映技术人员实行四等八级工资制,1963年又把电影放映人员工资等级从八级改为十一级。

(29)据记载“各村寨还制定乡规民约,村寨青壮年文盲无故不参加扫盲学习者,由生产队每次扣工分5~10分。”参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6页。另据记载“学员每缺课一次,扣工分2至3分。”参见政协湖南省祁阳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宣教卫体委员会、祁阳县教育局编《祁阳文史》第十九辑,《祁阳县教育志》第三卷,2007年,第296页。

(30)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发布全国统一的脱盲标准,规定农民学完社、县、省编三种课本后,大约认识1500个字,能大体上看懂浅显通俗的报刊文章,能记简单的账目,写简单的便条,会简单的珠算。

(31)据记载:祁阳县茅竹公社对于毕业考试成绩优秀的学员实行工分奖励制度,一名奖150分至200分,二名奖100分至150分,三名奖100分至120分。一些地方出台硬性规定,对达到结婚年龄而又未脱盲的男女青年,脱盲后才开具结婚证明,否则要收取一定的教育费。参见政协湖南省祁阳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宣教卫体委员会、祁阳县教育局编《祁阳文史》第十九辑,《祁阳县教育志》第三卷,2007年,第295、296页。

(32)遵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难忘的知青岁月》,2013年,第136页。

(33)刘广宇《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电影放映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第202页。

(34)邵培仁、杨丽萍《电影地理论:电影作为影像空间与景观的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35)何扬飞《农村老人宗教信仰状况——基于全国293个村4328位老年人的调查与研究》,《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31日。

(36)朱高林《1949~1978年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

(责任编辑:陶婷婷)